事件观

雇一个人，而不是一双手

□ 刘 言

“打工人”挂在脖子上的工牌，有一天会成为“镣铐”，这似乎只在科幻影片中出现的情形，悄然渗入现实。

上周，有网友在招聘网站发现，一家公司招人销售“过程管理工牌”的产品。该工牌可实时查看员工个人、团队成员行动轨迹，让员工在指定地点通过指纹打卡。领导还可实时聆听员工工作方式、谈判话术是否规范等，“让每一位员工都可同时受到领导远程陪访”。

这事儿被发到微博上，引发数万人吐槽，“国内罪犯还没戴上电子脚镣，打工人倒要先用上社畜工牌了”。

公司创始人解释，开发该产品是为了“让好的人更好，坏的人无处遁形”。该公司网站对产品使用场景的描述更直指员工“摸鱼”——外勤型员工打完卡离开公司后，无法确认其是否在工作状态，有人回家补觉，有人三五成群网吧打游戏，组长无法及时监管自驱力低的员工，“导致每日工作8小时，实际4小时都没有”。

其实，其他类似“物联网管理工具”已经被应用在环卫工人、外聘工程师等群体，不仅实时掌握员工的作业情况，监管考勤，有的还能划定“电子围栏”：工人进出入区域时第一时间上传信息至管理平台。有的产品还宣传具有监听、通话功能。

“我是打工又不是签卖身契。”面对这样的管理工具，“打工人”的第一反应是，企业这样监控员工不违法吗？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通过手机定位进行考勤管理的案件近年来屡见不鲜。

2016年，就有媒体报道过针对销售人员的定位打卡App，企业在后台可以查询员工的实时位置，被监测员工如果在一个位置逗留超过10分钟，这个定位就会被记录。轨迹精确，显示到门牌号。软件公司透露，企业可以设置在周一到周日中的任何一天、任何时间段定位员工。

2020年，《工人日报》曾报道过一起销售人员未按公司规定用类似软件“移动考勤”的劳动纠纷案件。杨某为北京某公司推广便利店订货软件，2018年，公司以杨某上报考勤不合规视为旷工等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在劳动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等赔偿后，公司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管理权，杨某作为劳动者应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公司以定位软件打卡的形式监督员工具有合理性。杨某明知相关规章制度，未能自证工作事实。鉴此，法院认为，公司与杨某解除劳动关系，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故公司无需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主审法官释法时表示，以手机定位方式统计考勤有优点，但缺点是可能会涉及到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

2021年11月1日起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得更为明确，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属于个人敏感信息，需要取得个人的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但如果属于“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这样的情形，不需取得个人的同意。

对企业而言，使用类似的定位考勤必须守住法律边界。一方面，按照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决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时，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员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还要进行公示、告知劳动者。而另一方面，企业在具体操作中，也要形成完善的管理机制，在员工工作时间之外，不应任意查看其位置等隐私，更要保障员工的隐私不外泄。

只不过，“打工人”常常不得不接受公司的格式条款和硬性要求，也往往难以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制约。这还只是摆在明面上的，网友对所谓“过程管理工牌”的愤怒，大多来自日常的感受。

据媒体报道，在被称为“大厂”的互联网公司，有着被称为“潜网”的看不见的监控体系。公司内网、社交媒体，甚至无意中吐露的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潜网捕获。包括但不限于登录内网时截屏、在工作软件中提到竞争对手公司的名字以及请同事提前2分钟帮忙代打卡。

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去年11月，国美公司内部发布一份《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将涉事员工的姓名、部门、所在楼层以及在工作时所有流量信息都公之于众，其中一名员工因为使用网易云音乐的流量达到22.5G而被处罚。

监控下的员工真的能如企业想的那样提高工作效率吗？就如网友所言，真正不摸鱼、认真工作的员工，也不会喜欢这个东西：一是因为人有逆反心理；二是因为这个东西的存在否认了自己的一切工作态度和能力——无论我如何努力，领导都只会认为是工牌的作用。再努力的员工，也有喘息的时间。”

80多年前，喜剧大师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就有着类似的场景。黑白色调的工厂里，老板通过一大块屏幕监控工人、下达指令。卓别林扮演的夏尔洛和其他工人，似乎被螺丝钉牢牢钉在生产线上，无法离开半步。工人稍有其他动作，就会遭到工长的训斥，还要忙不迭赶上流水线的进度，以至于精神恍惚，见东西就想拿扳手拧。

在那个时代，工业革命使得人们纷纷进入组织工作，工人被当成“人力成本”。按著名的汽车大亨亨利·福特的说法，“本来只想雇一双手，每次来的都是一个人”。对工人的管理也建立在一种基本的人性假设上，即人是一种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经济人”，金钱成为刺激工人积极性的唯一动力。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梅奥教授主持了著名的“霍桑实验”，在美国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进行，旨在探讨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对工人工作效率的影响。霍桑通过实验证明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成员，因此，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必须注重满足工人在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的需求。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中，提出了人力资源的概念。他提出，把员工看成“成本”，那就最大化地节约，把员工看成“资源”，就该最大化地利用，而人力资源有一种其他资源所没有的特性：具有协调、整合、判断和想像的能力。迅猛发展的管理学找出了许多最大化利用“人力资源”的方法，推动了这个词的流行，终于使之成为企业界的主流话语。

德鲁克曾提醒企业，“必须把工作中的人力当‘人’来看待”。不过，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实践中将人力资源——现在流行的说法叫“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同样看待——员工被看成企业拥有的某种物资，一些企业视本身需要而使用或者抛弃。企业把员工当“人”，似乎成为一种奢求。996、007，一些企业恨不得员工化身机器人，按照考评的指挥棒和设定好的程序无休止地为企业产生价值。

但正如德鲁克所说，“作为一种资源，人力能为企业所‘使用’，然而作为‘人’，唯有这个人本身才能充分自我利用，发挥所长。人具有许多独一无二的特质。和其他资源不同的是，人对于自己要不要工作握有绝对的自主权。”

这也是“摸鱼”产生的根源。企业想要真正发挥员工的能动性，单纯的考评、算法、监控恐怕都无法奏效，即使装满摄像头、定位器，好的管理机制和工作制度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把员工当人”。

几天前，社交媒体热搜榜上有条新闻，“全公司电脑Alt键一夜消失”。乍看以为是法治新闻，细一琢磨可以是“走近科学”。点开报道公布的监控视频才知道，原来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干的。员工说，为了防摸鱼，老板抠掉Alt键，防止他们使用“快速关闭窗口”和“快速切换窗口”功能，还在公司厕所装了信号屏蔽器。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诗歌除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左 橙

和许多人一样，闫纯君第一次见到“诗歌除外”这四个字，是在飘着油墨味的语文试卷上。最后一道作文题，要求排除那种特殊的文学体裁。

然而数年之后，成为老师的闫纯君，开始教山里的孩子写诗。第一节课，她把诗的定义写在纸条上，在学生面前撕掉，“诗不用这个定义，由你们的心定义”。

找不到“诗意”的地方

一切顺利的话，毕业之后，天津师范大学学生闫纯君将去往泰国，在一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然而时值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闫纯君出国任教的计划一拖再拖，不得不回到家乡山西吕梁，参加各种考试，寻找一份工作。

离她家不远的柳林县，有一所学校正在招聘特岗教师。“龙花垣”这个名字让闫纯君印象很深，她看过一部偶像剧，女主角生活的地方有着相似的地名。

电视剧里，那个地方山清水秀，充满诗意，闫纯君满怀期待地报了名，顺利通过笔试、面试。父母不放心，陪她去学校实地考察。

跑这一趟，三个人都傻了眼。

“垣”在当地方言里，是“山头的一块平地”。龙花垣学校坐落在山顶，从柳林县城过去要翻过两座山，穿过一条沟。一块四方的水泥地面兼具篮球场、操场、停车场功能。旱厕里，数不清的绿头苍蝇用嗡声宣示主权。闫纯君想不出一句美好的话，能用来形容这里。

她的父母先迟疑了，问她：“环境太差，你要待吗？”

闫纯君陷入纠结之中。一方面，她想起曾看过的一部纪录片，讲述乡村教师给孩子们上诗歌课，让他们记录身边的小小世界，孩子们笔下满是纯净和希望；一方面，她又自己克服不了艰苦的条件。最[illegible]生活的好奇心胜出了，闫纯君[illegible]工作[illegible]同。

来到龙花垣学校以后，闫纯君回忆，自己总有种错觉，“误入了哪个文艺片导演的摄影棚”——学校的设施和环境过于“复古”，讲台被几块砖垫高，桌子、凳子是怀旧电影里常见的款式，关不住的教室大门需要用凳子抵住。假如风吹开了12个班级其中一间教室的破门，可以看到衣着朴素的孩子们，脸上黑黢黢的，仿佛刚从煤炭里钻出来。

在这里，不洗脸可能要比洗脸干净。因为学校位于山顶，无法打井取水，家家户户都修建水窖，收集雨水来用。闫纯君在学校，每天从水窖接上一盆带着土色、完全看不见盆底的水进行洗漱。一旦回市区的家，她看见水龙头流出清澈的热水，都要激动一番。

龙花垣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小学部一个年级一个班，每班20人左右，初中部一个年级两个班，每班30人左右。因为学校食宿免费、寄宿制管理且两周放假一次，周边需要务工且并不富裕的家长便把孩子送到这里。闫纯君报考的岗位，是初中语文老师。

她原以为，自己从入校起便是“一名合格的语文老师”了。然而这个设定在她第一堂课前的几个小时被临时改变：校长在上午11点告知闫纯君，下午第一节上英语课，以后就带初中的英语和政治。

闫纯君硬着头皮上了第一堂初中英语课，因为没有准备教案，她临时和学生们聊起对英语的认识，问他们计划英语考试考多少分，孩子们对这个话题或逃避或毫无兴趣，有人报出“50分”的答案。

年轻的闫老师拥有了从教生涯中第一个“语重心长”的时刻，她望着窗外远处的两座山说：“如果你们只待在村子里或者柳林县里，英语是没有太多帮助，但你们还这么小，学好英语可以走得更远。”

比没有准备教案的英语课更难熬的，是山里的蚊虫。闫纯君经历了好多个被叮咬到无法入眠的夜晚；因为最初不适应旱厕，她曾忍了几天不大便，忍到便秘，最后只能羞涩地拿起开塞露。

她也观察到校园生活的另一面。55岁的校长每天早晨5点半就起床陪学生跑操，一天不落。因为不少学生家庭贫困，父母离异，所有老师都在扮演爸爸妈妈的角色。冬天，老师会挨个检查学生们有没有穿上秋衣秋裤。哪个学生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出现在校园里，总有老师呵斥他回去擦干。饭碗不见了、暖壶碎了、和同学吵架了……学生会向老师求助，闫纯君决定，“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老师”。

在同一个班里，学科总分860分，有人能考到680分，也有人是150分。有一次，闫纯君气得要打学生手板，“孩子伸出十个黑乎乎的手指头”，她一看心又软了。为了帮学生提升成绩，她放弃了集中收集、批改作业的方式，采用面批面改的形式，让学生们写完以后一个一个交到她的办公室兼宿舍，她一边改一边教。

学生走出教学楼以后，再走10米，就来到闫老师的宿舍。她的生活与办公两用桌上，试卷与碗筷交替堆放。午间12点到2点，晚间6点到7点半，晚自习以后的10点到11点，都是闫老师宿舍的“谈心时间”。

同学间的矛盾、暗恋谁的心事都可以告诉她，有人煞有介事地强调“不许说出去”，也有人拿过老师的手机，用她的社交平台账号给自己的账号点赞、加关注。

也是在那间小屋里，闫纯君听学生讲起父母离异再婚的故事、下矿挣钱的故事、外出务工的故事……闫纯君感到心疼，十二三岁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却早早领略了生活的复杂况味。

在一次家访中，闫纯君很熟练地向同行的老师介绍，这是某同学的弟弟，叫什么名字，这是某同学的妹妹，又叫什么名字，惹得那位老师很好奇：“这是你亲戚？”

和同学愈发亲近以后，闫纯君又惦记起那部当初鼓励自己走进乡村校园的纪录片。2021年9月，在成为老师的第二个新学年伊始，她准备了第一堂诗歌课。

她撕掉了诗歌的“定义”

闫纯君把网络中找到的关于诗歌的定义写在一张纸条上，上课时，她快速念了一遍，然后问同学们，记住了吗？

没有一个孩子举手。闫纯君马上撕掉了那张纸条，对学生说：“写诗才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不需要怀才不遇，不需要长发飘飘，虽然这一刻你们是教室里的学生，但下一刻你们拿起笔，你们就是诗人。”

闫纯君后来回想，从专业角度看，自己这种教法可能不完全对，但目的是让学生自信地提笔，记录内心所想，“先不管那么多”。

那堂课的最后10分钟里，十几岁的孩子们开始展现非凡的自信和才华。他们从老师的PPT里读到了几首同龄人写作的诗歌，便一个个开始低头创作。

“心灵的灯/在夜晚光明/在白天熄灭”(小霞)

“书/你内心这么丰富/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烦恼了”(小霞)

“那个身影/跟伟大的母亲相差无几/她勤勤恳恳/毫无怨言”(阿豪)

下课后，闫纯君趴在办公桌上，给好几首小诗写评语，不吝赞美，“这首小诗太惊艳了”，她写上3个感叹号，又写道“我被你的文笔和细腻惊艳到了”。

后来，写诗成了这所学校的流行文化。有学生提交作业时，夹上一张字条，上面是新写的诗；有时不是一首诗，而是一封倾诉的短信，讲自己在家庭和人际关系中遇见的困境。闫纯君回复每一张纸条，给诗写评语，写疏导学生心理的句子。

阿豪最爱写家和母亲。在收到这个小男生的诗之前，闫纯君只知道他是班里的“睡觉大王”，家访以后才知道，他父母离异，各自组建新家，阿豪跟过母亲，初中以后又跟着父亲。他在两个家庭里都找不到安全感，却又对家庭的温暖充满渴望，于是在诗里写下对家的理解——“有了它/生活的一切痛苦都是那么转瞬即逝”。

在后来的作业本里，阿豪附上了一首《孤独》，一首《火把》，字里行间，透露着少年内心的压抑和迷茫。闫纯君给《火把》写评语，最后一句是：“希望你能坚持寻找心中的‘火’。”她开始不动声色地给予阿豪更多关注，上课时多看他几眼，改作业时留意他的学习状态。

闫纯君发现，写诗这件事，让孩子们开始发生改变。

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小伟，原本是“每个班都有的那种‘隐形人’”，不惹事，不学习，话不多，成绩也不好。

第一堂诗歌课，小伟交上来的是“一声口令下，赛车犹野马。一次的胜利，没赢也没关系”。闫纯君说，这首诗本身不完美，但她看到平时安静、没存在感的学生写出“赛车犹野马”的速度和“没赢也没关系”的态度，会为这种“反差”惊叹，“我看见这个不善言辞的小孩，内心的宽广世界和豁达态度”。

那之后，闫纯君给了他更多的鼓励。小伟开始狂热地创作小诗，他用诗歌写书籍、家人、祖国甚至包括天堂和地狱，还记录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他被同学称为“诗人”，非常享受这个外号。

“不过，他的小诗有时候并不能称之为诗，仅仅是分行书写的一段话。”闫纯君说，但她藏起了批评，反而给小伟写下这样的评语：“老师能感受到你的思想正像一只小鸟，飞出了囚笼，坚持用文字表达自己，看好你！”

小伟把这张便利贴评语贴在每天使用的水杯上。如今，他成了课堂上踊跃表现的学生，听课、记笔记也很认真。

“虽然我是第一次当老师，但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诗歌的力量，看到了鼓励的力量，看到了教育的意义。”闫纯君充满成就感地说，“没有笨孩子，只有暂时还没发现兴趣点的孩子，我非常荣幸帮助小伟发现了他的兴趣，使他变得更开朗和自信。

在某一天的作业本里，闫纯君收到了妮妮的第一首诗。

“从前的我/喜欢玩乐/喜欢交谈/喜欢交友/很快乐

那件事后/学会装乖/学会假笑/学会说谎/很假

现在的我/不愿相信/不愿真心/不愿多说/很冷”

在闫纯君的印象里，妮妮是一个娇弱的女孩儿，说话轻声轻语，不敢直视他人，和母亲打电话总是哭哭啼啼，“像一只未展翅的蝴蝶，藏在厚厚的茧里”。那首诗让闫纯君很忐忑：“‘那件事’，指的是什么呢？”

晚上，闫纯君把妮妮叫到办公室，问她的生活状况和内心所想。在老师的小屋里，小女生说出了很多心事，包括父母的艰辛、友情的破裂、学习的压力等。

最后，她敞开心扉讲起诗里提到的“那件事”：最好的朋友最近跟另一个女生更亲密，开始不理妮妮了。

闫纯君说，由于年龄差距和理解力差异，自己对学生情绪里的“小打小闹”确实无法感同身受，但她记得年少岁月里，成年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十三四岁少年心中，可能是了不得的痛苦与纠结。

从那首小诗引发的对话开始，妮妮更爱来闫老师的小屋了。她会倾诉沮丧和困惑，闫纯君教的物理课和思政课也成为妮妮最喜爱的科目。

闫纯君享受着山村小学的时光。母亲在家收拾东西时，要扔掉她的一盒彩色铅笔，闫纯君第一反应是，班里的小霞不爱说话，但很喜欢画画，便把那盒铅笔带给了小霞。

父母看出了闫纯君的投入，他们打趣说，独生女儿像是参加了综艺节目“变形记”，从之前怕冷、怕脏、不会做饭的小女生，变成了一名负责任的教师，学会了做饭，在简单的宿舍里“不改其乐”。

在诗歌课上，闫纯君给学生播放模仿古人吟唱诗歌的视频，讲诗歌里文脉和情感的流传，千百年经久不散。学生们也学古人用方言读诗，“三晋方言”的嘶吼在教室回响。闫纯君没想到的一个“后果”是，语文老师为此头疼，因为学生开始用方言读课文了。

闫纯君喜欢山顶的夜空，星星又多又闪，让人有“宇宙苍穹的壮阔感”：“好像我就站在银河系里，他们都漂浮在我身边，涌动、跳跃、冰冷地燃烧。”

小霞在诗里写过星星，讲的是流星错过了月亮，月亮羡慕星星成群结队。

“流星/你穿过夜晚的天空/与月亮刚好错过/却没有办法再次相遇

月亮/你看到星星的伴侣/是否会有些辛酸和孤独。”

绚烂星空之下，是孩子们绕不过去的现实。闫纯君也明白，写诗并不能改变生活现状，高考试卷也不让写诗。学校的升学率不高，学生中的很多人会像他们的上一辈一样，在附近的矿场工作，或者去县城开车、收废品、做保安、摆摊卖小吃、为红白喜事演出……但闫纯君认为，写诗至少能让他们不砸玻璃不打架，能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多抬头看看天上的星空，想起家乡的山。

也正是那两座山，其间的山沟里没有手机信号，会发生塌方，雨天会泥泞难行。闫纯君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她说，慰藉可能是漫天的星星，也可能是夹在学生作业本里的一百多首诗和小屋里的交谈。

在诗里，他们都是自由的

仅仅在两年前，这一切还完全不在她对未来的设想之中。

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秋天，闫纯君看见班级群里有人发了孔子学院的报名通知，她滑动鼠标，发现了一个“新闻传播”方向的志愿者岗位，又听了一场学校组织的宣讲会。激情被点燃了，她冲回宿舍向好友宣布：“我要去泰国教汉语！”

“扯淡呢？”好友一脸费解，表示往届的师兄师姐都在京津地区的传媒领域发展，且闫纯君已经为考研准备了半年。

闫纯君没有考虑去大城市，放弃了考研，瞒着家人，全心全意地申请泰国一所孔子学院的志愿者岗位。

没有汉语教学经验、不是师范专业出身，闫纯君临时自学了剪纸、中国结等传统手艺，在面试考场上了第一节汉语课，打起了高中体育课上学的太极拳，热情地侃侃而谈。之后的某一天，她收到一份拟录取通知，才回家告诉父母。

起初，父母认为这是女儿的“异想天开”“玩笑话”，但闫纯君很坚决，她讲述了前因后果，保证任期结束回家。

在那段日子里，闫纯君一直在搜集、整理学校的资料，和一同入围的小伙伴成立了“曼谷小分队”，设定了假期聚会的路线，甚至幻想了相聚的场景。这群年轻人在2019年12月去往大连外国语大学，培训泰语、茶艺和绘画。

那个12月，一起备战考研的同学走进考场。闫纯君在大雪纷飞的大连给她们发去祝福和培训趣事，同学向她诉苦，因为一位“不知知网”的明星博士，研究生招生和毕业审核都更加严格了。

也是在那个12月，后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初露爪牙。一个月后，武汉封城。

当时，闫纯君并未预料到，新冠肺炎疫情会改变她的人生轨迹。然而那一年，返校日期一改再改，最终定在6月。毕业典礼取消了，前往泰国的计划中止了。大家都在等待消息，但没有人有准确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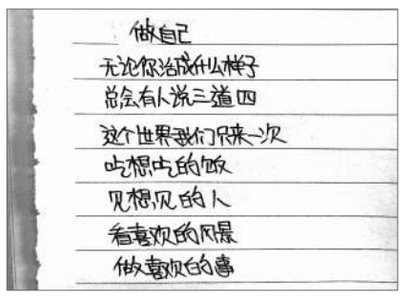
5月的赴任日期一过，闫纯君感觉自己像“风中的蒲公英”，不知道下一步的去处，直到她来到龙花垣，在这个不怎么诗情画意的地方，找到了真正的诗意。在那些便利贴上、作业本里、草稿纸上、专门写诗的笔记本中，少年用稚嫩的笔体写着点滴思绪，借诗歌的力量跳出课本和大山。

闫纯君说，这些孩子大多家境一般，与父母聚少离多，怯懦的、回避的他们，被诗歌赋予表达的勇气。因为在诗里，他们是自由的、特别的，甚至是“厉害”的，不会遭到贬低和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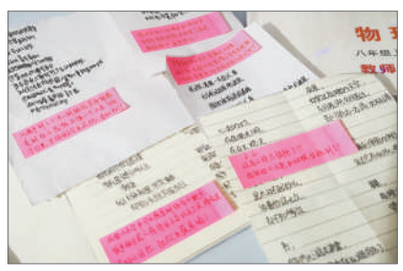
在龙花垣工作了几个月后，闫纯君得知，去泰国任教的志愿者计划再次启动了。但她没再动心，只是偶尔怀念那个秋天的下午，她跑回宿舍，冲动地对好友讲着自己的出国计划。时间流逝，闫纯君记得，她与好友幻想着未来，那些场景里，没有排除“诗歌”这一项。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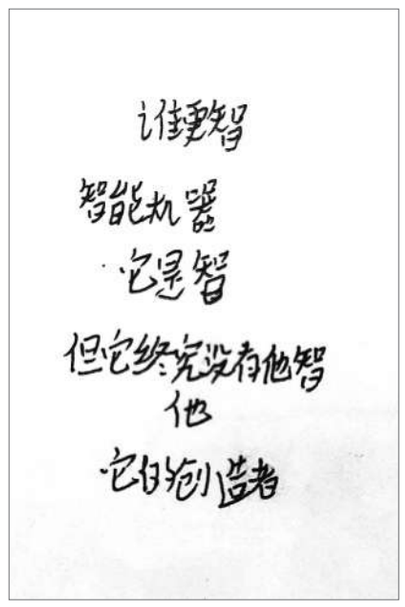
闫纯君在上物理课。



刘语言同学创作的《做自己》。



闫纯君给学生作品写的评语。



乔子梦同学创作的《谁更智》。

龙花垣学校的教室。